

## 中國崛起之近代歷史個案簡要比較

### China Rise: A Brief Comparative Study for Cases in Modern History

蔡東杰

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

#### 壹、權力轉移之理論與概念暗示

隨著全球化浪潮自 1970 年代以來逐漸受到關注，加上冷戰結構在 1991 年因蘇聯瓦解而正式告終，不僅某種變遷（transformation）跡象愈發明顯，在既有理論框架的解釋力紛紛受到挑戰之餘，一些新的理解與預測角度也受到重視，例如相較於傳統權力政治慣於從靜態結構角度來觀察國家間關係，如今則更重視國際內涵之動態性變遷的「權力轉移理論」（power-transition theory）一度吸引了更多目光。<sup>1</sup>

從權力轉移理論的角度看來，霸權更迭在歷史上既很自然，亦很難不是國際衝突的因變數，至於國際間爆發衝突的原因，又不外乎是國家之間權力對比出現均衡（parity）或甚至超越（overtaking）現象所致。<sup>2</sup>其中，所謂「均衡」意指潛在挑戰者在完成了某種「追

---

<sup>1</sup> 此概念最早由 A.F. Organski 提出，相較於傳統傳力平衡（balance of power），他認為權力很難被真正地平衡；A.F. Organski, *World Politics* (New York: Alfred A. Knopf, 1958).

<sup>2</sup> A.F.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, *The War Ledger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

趕」(catch-up)政策(這通常暗示藉由成功的經濟成長而提升其軍備競賽與政治影響力)後,權力值逐漸拉近與霸權國家距離。<sup>3</sup>至於超越,則是指潛在挑戰者不僅有效拉近與霸權國家的權力差距,甚至透過某種躍進式發展導致其能力凌駕於原先霸權國家之上。<sup>4</sup>該理論進一步指出,一旦出現「客觀」的均衡或超越現象,以致影響相關國家對於國際權力分配現狀之「主觀」看法時,爆發國際衝突之機率將相對提高。換言之,當原先持現狀政策者不再滿意於既存權力規則時,無論霸權國家或挑戰者都可能透過發動「先制攻擊」,以便取得對於未來秩序的優先發言權。<sup>5</sup>

值得注意的是,儘管「權力」問題經常是國際衝突的源起,但權力轉移理論不認為這些衝突一定都環繞「霸權」位置打轉;換句話說,正因權力問題無所不在,而國際權力結構本來也呈現著階梯式金字塔狀態,因此,理論上國際衝突可能發生在結構中的任一階梯,亦即在中小國家間也到處存在對立情勢。根據權力轉移理論對所謂「權力層級化」現象的描述,它將國際結構權力金字塔區分成了主宰國家(dominant nations)、強權國家(great power)、中等國家(middle power)與弱小國家(small power)等4個層級,至於所

---

1980); Manus Midlarsky, *The Onset of World War* (Boston: Unwin Hyman, 1988); Jacek Kugler, et al., *Power Transition: Strategies for the 21 Century* (New York: Chatham House Publisher, 2000).

<sup>3</sup> Moses Abramovitz, *Thinking about Growth and other Essay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9), pp.220-242.

<sup>4</sup> Elise S. Brezis, Paul R. Krugman, and Daniel Tsiddon, "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: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," *American Economic Review*, 83:5(1993), pp.1211-1219.

<sup>5</sup> 近年來由 Graham Allison 提出之「修昔底德陷阱」(Thucydides Trap)概念,也不啻反映了類似想法。Graham Allison, "The Thucydides Trap: Are the U.S.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," *The Atlantic*, September 24, 2015; *Destined for War: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's Trap* (New York: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, 2017).

謂權力則由能夠作戰與工作的人數、國民經濟生產力，以及政治系統整合資源完成國家目標的能力等 3 個要素所共同組成。

其次，除了凸出結構的動態性外，權力轉移理論與傳統權力理論之差異還在於，它主張安全議題與經濟議題是沒有差別的，也就是說，它假定國際經濟關係與權力關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，而決策者在合作或競爭間的抉擇，往往也引導著政治與經濟的互動。<sup>6</sup>特別對不滿意的國家（無路霸權或挑戰者）來說，除了傳統安全威脅層面，經濟考量亦將成為決策重心，據此，權力轉移理論提出了幾個假設：（1）強權國家可能使用貿易政策來轉變不滿意國家的喜好（例如美國在 1947 年建立布萊頓森林體系，在 1980 年代後普遍利用所謂 301 條款，或 Trump 政府在 2018 年對中國發起之全面貿易戰）；（2）儘管不易進行長期觀察，但以經濟制裁對付不滿意國家在短期內可能是有用的；（3）強權國家多半會盡力維持貨幣穩定（本國匯率與國際市場），因為它們是此種穩定的最大受益者；（4）為避免出現「均衡」或「超越」現象，多數強權國家都會限制高質量勞工與關鍵技術流向潛在挑戰國家。

總而言之，當國際合作持續時，特別是如果所有滿意現狀的國家之間能完成政治與經濟的整合，則儘管發生所謂權力轉移現象，體系的和平與穩定仍能夠被確保。不過，國內經濟擴張的動力仍會帶來國際結構重塑的效果，而結構內涵的改變與權力重新分配則會增加戰爭爆發的潛在可能性。

## 貳、崛起之內、外部條件

在聚焦權力轉移的「轉捩點」（turning point）之前，不僅瞭解帶

---

<sup>6</sup> Jacek Kugler, et al., *Power Transition: Strategies for the 21 Century*, Chapter 5.

來均衡現象之大國「崛起」(rising)同樣重要，進一步問題包括：何謂崛起？如何才能崛起？如何能支撐崛起以致超越既有強權？既存領導強權如何看待崛起現象並加以應對？對此，我們先將目光聚焦在追趕者身上，其「成功」條件至少包括了以下 4 個部分：

(1) 必要之制度變革：如前段所述，所謂崛起反映了某種「權力差距縮小」之現象，且倘若排除了領先者之「絕對衰退」(absolute declining)的話，這意味追趕者必須透過制度變革，找到提供「加速度」之可能性，以便提高效率在短期內擴大權力累積規模，從而對領先者帶來威脅。此種變革多半具有政治與經濟複合性，前者主要在降低交易成本，後者則主要在提高生產效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制度變革在人類歷史中個案甚多，但多數未能成功，且即便成功也未必能外溢至追趕現象上。

(2) 足夠時間：即便制度變革方向正確，亦即其結果確能有效地提高累積效率，畢竟最終目標乃「縮短權力差距」，因此足夠的時間既不可免，從歷史事實看來，所需時間至少也在 50-100 年之間。

(3) 有利之地緣位置：前面兩項條件乃追趕者可「嘗試主動掌握」的，不過，即使選擇了正確之制度變革方向，且可持續一段時間進行累積，由於這些作為均不可能秘密且往往公諸於世，因此必須同時關注領先者的「感受」。從某個角度看來，領先者雖似乎「不可能容忍」前述追趕過程，一旦認定其為威脅，自然也會採取反制措施，此時，追趕者之地緣位置或將導致 2 種結果：首先，假使追趕者在崛起時處於體系相對邊陲地位，將因受到較少關注而爭取更多時間，其次則追趕者若「不幸」處於體系相對核心位置，則將因視覺聚焦效果而可能提前遭到壓制。

(4) 成功應對挑戰：除了可能因處於權力真空，或因存在均勢

體系以致缺乏明顯領先者之外，根據國際結構之階層性特徵及其權力慣例，以及前述權力轉移理論之暗示，一旦追趕者成功縮小權力差距，則勢必受到領先者反制，從而帶來崛起過程的關鍵「挑戰時刻」(challenging point)，而這也將決定崛起之最終發展結果。

### 參、大國崛起與權力轉移之歷史案例

在近代歷史中，我們可找到以下若干崛起個案，包括：十七世紀法國，十八世紀末的英國，十九世紀末的美國、德國、日本，以及二十世紀末的中國等（如下表所列），以下便就其發展分別簡述。

表：大國崛起之若干歷史個案

國家	關鍵年代	制度變革	結構位置	權力挑戰
法國	1590s-1640s	宗教寬容、開明專制	歐洲核心地帶	三十年戰爭、天然疆域
英國	1690s-1790s	光榮革命、工業革命	歐洲邊陲地帶	採行光榮孤立政策
美國	1830s-1900s	西進運動、自由資本主義	歐洲以外邊陲	採行孤立主義政策
德國	1860s-1890s	俾斯麥式國家資本主義	歐洲核心地帶	兩次世界大戰
日本	1870s-1910s	明治維新	位處遠東地區	華盛頓會議
中國	1980s-2010s	改革開放政策	位處遠東地區	美中貿易戰

#### （一）法國

雖然十二世紀末腓力二世（Philippe II Auguste, 1180-1223 在位）時期，法國曾由落實社會關係的貨幣化出發，以專業人員取代兼職

貴族，組成一個更有行政效率的官僚體系，從而一度創造出某種「崛起」跡象，但因十四世紀中期以後的一個世紀中，包括飢荒、黑死病與英法百年戰爭最終仍帶來挫折。尤其在十六世紀初宗教改革導致了教派紛爭，其中 1618-48 年的三十年戰爭不但是歐洲首度「世界大戰」(world war)，也為法國再次提供了崛起契機。首先是亨利四世 (Henri IV, 1598-1610 在位) 於 1598 年頒布《南特敕令》(*Édit de Nantes*)，宣布信仰自由並提供社會和解與經濟復甦之契機，接著則路易十三 (Louis XIII, 1610-43 在位) 則在李希留 (Richelieu) 輔佐下建立起一個中央集權式現代國家，並利用當時歐洲領導者，以神聖羅馬帝國為核心之哈布斯堡王朝衰退之際，成功結合西北歐封建貴族在三十年戰爭中取勝，建立霸權基礎。至於路易十四 (Louis XIV, 1643-1715 在位) 時期，則進一步鞏固絕對君主制，並以建立「天然疆界」為由，數度介入或發動國際戰爭。

## (二) 英國

相較法國透過專業官僚機制與集權制度來提高政策效率，英國則提供了一個相對案例。長期處於歐洲邊陲 (無論權力或地理位置) 的英國，因弱勢王權帶來長期政治分權 (de-centralization) 特徵，尤其在 1688-89 年之光榮革命 (Glorious Revolution) 帶來《權利法案》(*Bill of Rights*) 並奠下內閣制基礎後，相較法國透過專業官僚以提高政策效率，英國則在分權制下追求「理性、自由、彈性」等制度原則，加上 1760 年代做為工業革命先驅帶來的爆發力，從而使其獲得了崛起的歷史契機，至於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後引發的拿破崙戰爭亂局，更讓英國得以利用其邊陲位置，避免被完全捲入爭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英國雖一般認為在十九世紀具有「霸權」(hegemony) 地

位，實則國際影響力有限，這也是它為何長期自稱採取所謂「光榮孤立」(splendid isolation)政策的緣故，<sup>7</sup>至於此際歐洲大陸陷入均勢(balance of power)競爭狀態，則使英國在崛起過程中免於面對既存領先者的挑戰。

### (三) 美國

在利用法國革命及其後歐洲亂局保障獨立地位後，直到十九世紀為止，美國始終透過其「孤立主義」外交傳統，避免被捲入複雜之歐陸局勢。無論如何，起自十八世紀末的「西進運動」(Westward Movement)，尤其 Andrew Jackson 總統於 1830 年簽署了《印地安人遷移法案》(Indian Removal Act)後，一方面讓美國得以加速擴張領土，<sup>8</sup>1860-64 年的內戰也在黑奴獲得「解放」之餘，使其擁有推動工業化所需的勞動力來源，從而埋下崛起伏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直到十九世紀末期為止，美國的崛起態勢仍不顯著，無論美國 Alfred Mahan 在 1890 年出版《海權對歷史之影響》(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)一書，凸顯出美國因隔了兩大洋以致遠離世界島，因此處於絕對地緣困境之可能焦慮感，1893 年經濟危機亦動搖了其社會穩定基礎，不過，如同十八世紀末，位於大陸邊陲的英國利用歐洲權力政治動盪作為崛起契機一般，因相隔大西洋更遠離歐洲的美國，也以二十世紀初期兩次世界大戰為機會，將地緣劣勢化為優勢，同時在制度面落實自由資本主義，最終取代英國成為新興霸權國家。

---

<sup>7</sup> 所謂「光榮孤立」並非英國自稱，且其內涵主要為「不結盟」(non-alignment)。

<sup>8</sup> 1846-48 年的美墨戰爭(Mexican-American War)也讓美國獲得墨西哥近半數國土。

#### (四) 德國

相較於英國與美國，德國的地緣特徵與法國較相近，甚至更接近歐洲大陸核心位置，甚至因地處東歐大平原（西起法國北部，向東延伸至烏拉山脈），使其承受更大之地緣壓力。在 Bismarck 於 1862 年擔任首相後，先以鞏固王權與軍國主義（militarism）等集權化政策，在 1871 年完成民族統一，其後，則以「國家資本主義」（state capitalism）作為工業化追趕原則，在短短 30 年內崛起成為一個潛在的強權國家。德國的快速崛起不僅受到英國關注，後者一方面自 1890 年代起被迫逐步放棄「不結盟政策」，並在 1900 年代對德國發起海軍競賽，甚至從某個角度看來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啻是場「修昔底德式戰爭」（Thucydides War），最終以德國戰敗，英國暫時保住其霸權結尾；至於 Adolf Hitler 在 1930 年代帶領德國再次崛起的結果，則再度引發另一場「修昔底德式戰爭」（二次大戰），德國與英國兩敗俱傷，美國則趁勢崛起成為霸權。

#### (五) 日本

作為十九世紀末「非西方崛起」典範，自 1868 年起的「明治維新」顯然是日本崛起關鍵所在。在此之前，日本長期存在分權式封建體制，江戶時期在 1633-1854 年間的「鎖國」政策雖提供了社會穩定基礎，並由此帶來一定經濟增長，但此種內向式保守主義（inward conservatism）畢竟難以因應歐洲挑戰。如同中國在 1860 年代推動的「自強運動」，日本的「明治維新」亦試圖引進西式制度來提高政策效率與國家競爭力，但差異在於結果迥異。更重要的是，日本不僅透過制度現代化自我轉型，位於遠離歐洲，甚至在東亞也地處邊陲的位置，顯然成為有助其轉型成功的地緣因素；儘管如此，1921-22



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（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）仍顯示了西方嘗試進行壓制的企圖。其後，日本雖一度利用歐洲戰爭危機來緩解壓力，最終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到美國所控制。

#### 肆、歷史啟示與中國崛起之前景

基於篇幅限制，本文無法對前述近代歷史崛起案例進行詳盡描述，但透過提綱挈領之整理，同時參照前述所謂「崛起之內、外部條件」，或許仍可獲致以下 3 項初步之觀察結果：

（1）關於制度改革：制度改革雖為崛起之「必要條件」，但是在方向上缺乏邏輯一致性；例如，集權性改革（法國、德國、日本）雖然可以提高效率，但同時可能減損政策理性，至於分權性改革（英國、美國）雖可以提供彈性與機會，但通常無法兼顧效率面向（通常需花更多時間完成崛起）。當然，關鍵變革通常必然涉及「關鍵人物」，但此處暫且略過不提。

（2）關於地緣位置：位於相對具邊陲性之地緣位置（英國、美國、日本）將因可能受到相對較小之結構壓力，而獲得崛起契機（包括相對充足之時間），相對地，若地緣位置趨近結構核心（法國、德國），則一方面壓力較大，亦或可能驅使其傾向集權式改革與激進式對外政策（更頻繁運用戰爭手段）。

（3）關於修昔底德陷阱：若當時國際結構階層化特徵明顯，且居於地緣核心位置（法國、德國），則崛起過程或將出現部分之「修昔底德現象」（此一推論其實無法提供絕對定義），相對地，若國際結構趨於權力分散，且地緣位置略偏邊陲（英國、美國），則前述現象或許較不明顯。

據此，我們可進一步觀察近期之「中國崛起」現象。

自 1978 年啟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，至少在經濟層面，中國的正向發展便已清晰可見的速度前進，且正因中國崛起對美國霸權地位開始浮現潛在威脅，愈來愈多人開始關切其崛起之後續影響，包括中美出現「權力轉移」的可能，<sup>9</sup>以及中國是否轉變其原先傾向「維持現狀」之政策路徑。<sup>10</sup>無論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否正趨於更積極主動，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影響下，中國不僅在 2009-10 年間 G-20 高峰會中成為最受關注的對象，領導人胡錦濤更在 2010 年底《富比世》(Forbes) 雜誌所公布「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排行榜」中，擠下 Obama 高居首位，於此同時，中國 GDP 規模也正式在 2010 年超越日本，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。

除同樣進行了必要且傾向成功（相較十九世紀末）之制度變革外，中國在地緣上原也與日本類似，都位於遠離歐美核心的邊陲地帶，不過，隨著科技進步與全球化浪潮帶來「世界縮小效應」，尤其近年來亞洲各國在經濟、外交與軍事方面與中國愈發接近，使其隱然有朝向區域霸權地位靠近的跡象，<sup>11</sup>結果讓美國自 2009 年以來逐漸將戰略重心往東亞轉移，以因應中國崛起態勢及其對自身霸權的潛在威脅，從而間接縮短了中國與「核心」的距離。

---

<sup>9</sup> Ronald Tammen and Jack Kugler, "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-US Conflicts," *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*, 1:1(2006), pp.35-55; Thomas J. Christensen, "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? The Rise of China and U.S. Policy toward East Asia," *International Security*, 31:1(2006), pp.81-126; Steven Chan, *China, the US, and the Power-Transition Theory: A Critique* (London: Routledge, 2008).

<sup>10</sup> Alastair Johnston, "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?" *International Security*, 27:4(2003), pp.5-56.

<sup>11</sup> David Shambaugh, "China Engages Asia: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," *International Security*, 29:3(2004/05), pp.64-99; Brantley Womack, "China and Southeast Asia: Asymmetry, Leadership and Normalcy," *Pacific Affairs*, 76:4(2003/04), p.526; Paul H.B. Godwin, "China as Regional Hegemon?" in Jim Rolfe, ed., *The Asia-Pacific Region in Transition* (Honolulu, Hawaii: Asia-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, 2004), pp.81-101.

進一步來說，中國自 2000 年超越日本，成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後，對美國貿易順差便由 2002 年的 427 億美元增長到 2014 年 2370 億美元，甚至根據 IMF 估計，中國由 PPP 計算的 GDP 也正式在 2014 年超越美國（儘管名目 GDP 可能還得等到 2030 年前後），這些無疑都深化了美國的不安全感。

更甚者，從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預估點一路由 1990 年代的 2050 年、2000 年代的 2025-30 年，到 2010 年後波動於 2016-26 年間，超越點不斷被提前既表示出明顯的「追趕」態勢，相較冷戰時期美蘇對抗主要僅以「軍事」平衡為主，美中競爭顯然更全面性且差距更小。儘管雙方迄今似乎仍努力規避所謂「修昔底德陷阱」（直接軍事衝突），但考量到「核武嚇阻」為傳統衝突帶來之制約，以及前述經濟議題在當前國際社會之重要性與分量，即便中美當下存在的乃某種既非熱戰，也非冷戰，或許可稱「溫戰」（*tepid war*）的狀態，爆發軍事衝突的機率雖或許不高，但在經濟與政治（價值）等層面的激烈對抗卻早已不亞於熱戰。甚至從某個角度來說，目前的「貿易戰」（*trade war*）早已驗證了「修昔底德陷阱」，只不過其形式並非傳統途徑（軍事對抗）罷了。

在前述漸趨劍拔弩張之態勢中，中國似乎正以其經濟崛起提供的龐大能量為憑藉，利用金融海嘯提供的結構轉型契機，逐步朝向平衡者（*balancer*）或潛在區域霸權競爭者（*potential competitor for regional hegemony*）邁進。

從中國近期綜合國力大致仍持續上升，國際情勢則充滿各種衝突與潛在之不確定變數看來，利用當前國際結構「缺口」以落實其新世紀以來的「走出去」戰略，並以週邊（亞洲）為首要階梯，應該仍是未來中國對亞洲外交政策的思想指導原則，至於美國之政策

應對將如何影響其下一步與未來，<sup>12</sup>則需要持續進行觀察。

---

<sup>12</sup> Michael Clarke and Anthony Ricketts, "Donald Trump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: The Return of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," *Comparative Strategy*, 36:4(2017), pp.366-379.